

大元史冊掃葉人

Dai Ön teüke šastir-un jasayci :

洪金富著作目錄代序



洪金富先生
(2008 年 3 月 28 日攝於文物陳列館 707 研究室前)

吳國聖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古今論衡 第 32 期 2019.6

一、洪金富先生生平

先師洪金富教授，一九四六年生於臺灣高雄內門鄉木柵村長寮埔。「長寮」是對臺語「tîng liau/ lîau」[tj²⁴⁻³³ liau^{55/24}]的漢字音寫。^❶「長寮埔」意即「地形狹長的埔地」，位於二層行溪（即二仁溪）上游西側，山、河之間一狹長河階臺地上，與河流對岸的木柵庄（Bák-sa chng）相望。當地居民多為西方相隔一山的台南左鎮草山頂一帶遷徙而來、原籍福建同安（Tâng oaⁿ）的洪姓宗族，此外還有不少平埔新港社人。^❷

先生尊翁洪應仁，尊堂洪葉吉林，世居其地，俱享耆壽。木柵地區居民多以務農為生，以宋江陣、青鑼鼓陣聞名。基督教、佛教、道教、太祖／老祖信仰交會，各民族彼此往來密切。先生自幼生活在多民族聚居，宗教多元、地勢複雜的山間，注意到身邊親友有各種不同的語言與生活習慣，對非漢民族萌生了濃厚的興趣。

一九五八年，滿十二足歲時，從內門鄉木柵國民學校畢業，旋即離鄉背井，求學於省立鳳山中學。一九六四至六八年就讀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從姚從吾（1894-1970）師學習「遼金元史」。一九六八至六九年服兵役。一九六九年考上同系碩士班，一九七〇年四月姚師離世後，由陶晉生（1933-）師接續開課。一九七一年九月，蕭啓慶（1937-2012）師應聘臺大歷史系客座副教授，自美返國短暫執教一年，期間與陶師合開「內陸亞洲史」以及「西方對先近代中國歷史研究的評介」兩門課程。先生修習蕭、陶二師課程，接觸新知，感到與過去所知的傳統史學有相當大的不同，深受震撼，奠定了日後繼續深造的心願，成為求學歲月中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先生於臺大求學期間，思考未來研究方向，曾從陳奇祿（1923-2014）師學習「考古人類學導論」、「臺灣民族誌」。此外也在芮逸夫（1898-1991）、許倬雲（1930-）、李濟（1896-1979）、宋文薰（1924-2016）、李亦園（1931-2017）、高去尋（1909-1991）、衛惠林（1904-1992）、陳捷先（1932-2019）、李守孔（1923-2014）、廣祿（1900-1973）、

❶ 漢字「寮」為陽平聲，臺語發音為 [liau]。另臺語中亦有同義常用詞 [liáu]，聲調不同。此字本字可能為「條」[tíau]，[líau] 為較 [tíau] 部位更易發音的音轉。「tîng liau/ lîau」為形容物體形狀狹長貌的定語。「長寮埔」為非常小的地名，連兩萬分之一大比例尺的明治《臺灣堡圖》中亦無收錄，但從當地族譜資料觀察，應該在清中葉之後，長寮埔已可確定有漢人移入定居了。

❷ 左鎮草山頂（chháu soaⁿ téng）為高雄內門鄉多處洪氏宗親的公認祖源。其實不止漢人，岡仔林、左鎮一帶的平埔族也與木柵有聯繫。馬雅各醫師（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1921）一八七〇年到木柵教會時，就有拔馬（poáh-bé，左鎮內舊地名）的平埔人前來領洗。兩地之間僅有淺山相隔，應有固定往來的通道。筆者推測與沿著西側另一條二仁溪支流開闢，今名「高222線」的道路有關，該線中途有「花尚園」（和尚園/hōe-sīouⁿ hîng）、「烏西崙」（烏材崙/ò sai lûn）等聚落，亦居住自草山頂遷徙過來的洪姓居民。木柵地區是新港社（Sinkang）西拉雅族人在高雄的主要居住區域之一，以穆、机、車、姬、買、力、東、卓、兵等姓居民為顯著的民族標誌。這些姓氏都可以追溯到原西拉雅氏族名之簡稱，例如「穆」姓為 Tama domok，「兵」姓為 Tama tiping 最末音節之諧音漢字。此外李、葉、王、歐等尋常漢姓在木柵一帶也多為平埔族之後人。地方人士推測，先生尊堂所屬家族可能也具有西拉雅族血統。

札奇斯欽（*ᠵᠠᠴᠢᠰᠢᠴᠢᠨ*，1915-2009）等幾位先生課程上聽講，廣泛涉獵民族學與歷史學知識，對元代及與蒙古相關的內亞歷史益加關注。

蕭啟慶老師是比先生高十屆的臺大學長，因兩人同屬姚師和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1911-1995）門生，從來都以「學弟」稱呼洪師，不肯以師自居。對洪師時時關照、獎掖有嘉。相對地，洪師數十年來對蕭師始終執弟子禮，甚至對蕭師國內外的學生們，無論輩分，一律稱呼為學弟妹。是前輩學者間謙沖自持，惺惺相惜的一段佳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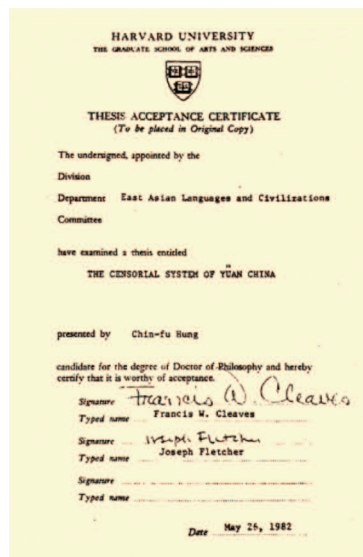
札奇斯欽師也是姚師研究室中的大學長，曾自願指導洪師閱讀蒙文本史書《*ᠠᠯᠲᠠᠨ ᠲᠣᠪᠴᠢ*》。^③二人每週一回，於姚師生前使用的臺大文學部第二研究室中，由洪師逐句試譯，札師適時訂正補充，為先生認識蒙古語文的啟蒙課程。雖為時未久，仍將全書譯出初稿。兩人原有出版計畫，唯未及修改，一九七二年札師轉往美國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未能繼續趨庭承教，譯稿迄未付梓，先生引為憾事。

在師長薰陶勸進之下，先生初窺蒙古史籍堂奧，逐步傾心元史。蕭師返美後，由陶師指導，一九七二年底撰成碩士論文《元代監察制度研究》，開啓此後三十年的元代監察研究之路。^④一九七三年起擔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後轉專任講師，開設元史課程。初次站上講臺，據班上學生回憶，先生教學認真，性格木訥靦腆，講課聲量不大。談及元代歷史時，眼睛發亮，炯炯有神貌，四十餘年後仍歷歷在目。在大學同學會中提起，咸認是眾人難忘的老師。當時教室裡修課的另一位劉增貴同學，日後成為先生在史語所的同事，師生情誼歷久彌篤。

③ 古代蒙古史籍之中有多部書籍，同名為《*ᠠᠯᠲᠠᠨ ᠲᠣᠪᠴᠢ*》（*altan tobči*）。洪師自述翻譯的是「*Altan Tobči Nova*」，漢譯為《黃金史綱》，英譯為 *A Brief History of the Mongols*」（見洪金富校定《元典章》，頁38-39），以上這段敘述有些複雜的問題。「*Altan Tobči Nova*」（nova 即拉丁文「新」，因其為新發現的 *Altan Tobči* 故有此名），作者為 *ᠪᠯᠤ ᠪᠵᠠᠩ ᠪᠰᠲᠠᠨ ᠵᠢᠨ*（*blo bzang bstan 'jin*）。其英譯名「*A Brief History of the Mongols*」為一九五二年哈佛大學影印本設定的書名，作者也是 *ᠪᠯᠤ ᠪᠵᠠᠩ ᠪᠰᠲᠠᠨ ᠵᠢᠨ*，參見 Antoine Mostaert,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ed.), *Altan Tobči: A Brief History of the Mongols by Blo bzang bstan 'dz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問題是此書一般並不漢譯為《黃金史綱》，應作《黃金史》，如羅桑丹津著，色道爾吉譯，《蒙古黃金史》（呼和浩特：蒙古學出版社，1993）。又此書一九七九年已由札奇斯欽譯註出版：羅布桑丹津編著，札奇斯欽譯註，《蒙古黃金史譯註》（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且序言提及此書是札師與姚師合作之產物，一九六二年已經定稿，一九六三年報告書刊行，顯然沒有十年後與師弟重新翻譯且約定發表的必要。又上引文中先生提及的「*Altan Tobči Nova*」和「*A brief History of the Mongols*」，與「《黃金史綱》」並非同一本書，疑有差誤。考慮各種可能性，筆者判斷洪師上課使用的教材，應為另外一部篇幅較短的《*ᠠᠯᠲᠠᠨ ᠲᠣᠪᠴᠢ*》（*altan tobči*），漢譯名為《黃金史綱》的書。此書較「*Altan Tobči Nova*」發現時間為早，蒙文本一九二七年已經在北京蒙文書社鉛印出版，較易取得：不知名撰者，《*ᠠᠯᠲᠠᠨ ᠲᠣᠪᠴᠢ ᠠᠨᠣᠩᠭ᠎ᠠ ᠠᠨᠣᠩᠭ᠎ᠠ ᠠᠨᠣᠩᠭ᠎ᠠ* = *Altan Tobči Anonym*》（*ᠠᠨᠣᠩᠭ᠎ᠠ*：*ᠠᠨᠣᠩᠭ᠎ᠠ ᠠᠨᠣᠩᠭ᠎ᠠ*，1927）。先生翻譯之時已有幾種譯本或整理本，更適合初學者作為教材。如小林高四郎，《蒙古黃金史：蒙古民族の古典》（東京：生活社，1941）。Charles R. Bawden, *The Mongol Chronicle Altan Tobči: Text, Transl. and Critical Note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55)等。後有漢譯本：朱風、賈敬顏譯，《漢譯蒙古黃金史綱》（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此書譯稿老師整理房間裝箱，一時無法找出，應於藏書中某處，設使日後出土，可據以驗證。

④ 先生研究所同班及前後屆同學，如同年畢業者林維紅、邢義田、胡平生、古偉瀛、趙綺娜、陳芳明、張永堂、黃俊傑、段昌國，次年畢業者杜正勝、梁庚堯、黃清連、鄧淑蘋、張炎憲等人，日後多在學界執一方牛耳。

四年教壇生涯後，一九七七年前往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攻讀博士學位，最初指導教授為余英時先生（1930-）。余師前往耶魯大學後，主要跟隨柯立夫以及傅禮初（Joseph F. Fletcher, Jr., 1934-1984）兩位指導教授學習。柯師為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 1878-1945）高足，曾至北平為哈佛大學收集滿蒙文文獻，又向碩學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 1881-1971）學習蒙古語。柯師以其英譯本《元朝秘史》，^⑤以及出版的大量蒙古文碑銘解讀著稱於世。^⑥傅禮初教授為柯師得意門生，以具備多種語文研究能力著稱，在學界久富令名。唯四十九歲正值壯年時，不幸罹癌去世，身後留下未完積稿無數。兩位導師之學術脈絡，承紹歐陸古典歷史語言文獻學（classical philology）研究法，注釋旁徵博引，不厭其煩。先生從柯師學習蒙文，從傅師學習其他內陸亞洲史，畢生深受影響，是少數曾長期親炙這兩位著名學者，並留下記錄的學生，提供學史關鍵證言。^⑦除此之外，先生還曾旁聽楊聯陞（1914-1990）、洪業（洪煨蓮，1893-1980）以及日本史專家 Donald Howard Shively（1921-2005）、Edwin Augustus Cranston（1932-）等師課程。留學一歷五年，一九八二年以博士論文 *The Censorial System of Yüan China* 完成學業。（圖一）



圖一：洪金富哈佛大學博士口試通過證明（1982.5.26），由柯立夫與傅禮初兩位指導教授簽名

畢業後兼程返國，是年九月進入中研院史語所擔任副研究員，一九八九年八月升研究員，至二〇一六年三月退休，六月轉兼任研究員。研究成果的大宗，都在史語所這段黃金歲月中完成。先生常言道：史語所成就了他的事業。在編著的傳圖藏《遼金石刻拓本》、《元代石刻拓本》目錄的序言裡，兩度提到「已為古人的史語所老前輩，最讓我懷念敬佩。沒有他們的先知遠見，辛苦收集，傳圖典藏的無數珍貴拓片，存亡可能不卜，許多研究可能無法進行，而遼金元三朝拓片目錄和選集，也就永無面世之

^⑤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⑥ 舉其重要者，有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48."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7 (1967): 76-102.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62 in Memory of Prince Hind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2.1/2 (1949): 1-133.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Edict of 1453 in the Topkapı Sarayı Müzes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3.3/4 (1950): 431-446.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5 in Memory of Chang Ying-Ju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3.1/2 (1950): 1-131.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8 in Memory of Jigün-te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4.1/2 (1951): 1-104.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46."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5.1/2 (1952): 1-123. Antoine Mostaert and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rois Documents Mongols des Archives Secrètes Vatican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5.3/4 (1952): 419-506.

^⑦ 先生對這段期間的敘述，參見其《校定本元典章》（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序言，頁39。

日了。飲水思源，情何能已。」^⑧他感謝同仁的幫助與包容，允其退休之後留在所裡繼續完成工作。爲了報答恩情，盡力研究傳圖藏遼金元西夏拓片，繼續完成幾部專書。(圖二)



圖二：洪金富先生（2000年前攝，史語所第一代網站研究人員簡介用照片）

除了史語所，先生的教學活動主要在清華大學歷史所。一九九三年二月，清大歷史所新聘爲兼任教授。一九九四年九月，蕭啓慶師也應清大聘，從新加坡返臺任教。師生二十餘年未見，終得經常見面往還，討論學問。洪師二〇〇三年改中研院與清大合聘，在清大曾開設「內陸亞洲史專題討論」、「遼金元史專題討論」、「蒙元歷史與文化」、「遼金元史專題」、「元典章研究」、「元朝文獻研究」等課程。他一共指導過七位學生的學位論文，其中清大歷史所就有六位。蕭、洪二師鞠躬盡瘁，培養出一批研究遼金元史的生力軍。

先生晚年持續研究工作，未曾停歇。二〇一九年二月逝世，享壽七十三歲。

二、研究旨趣評述

先生從一九七二年的碩士論文，到二〇一七年《元代石刻拓本目錄》的出版，四十五年學術生涯中，著有8部專書，20篇期刊論文，7篇專書論文。^⑨先生自謙著作不多，事實上其中幾部著作耗費時間甚鉅，如專書《遼金石刻拓本目錄》中收錄347種拓本，耗費十年；《元代石刻拓本目錄》中816種拓本，共用十六年；《校定元典章》本文80餘萬字，連校記共126萬字，歷時十六年。能累積如是成績，斐然大觀，實爲主其事者的恢弘眼界，加上毅力與堅持所致。

先師著作的內容，可歸納爲（一）元代監察制度、（二）胡漢語名義、曆日、制度之考證、（三）元典章、遼金夏元金石文字之整理校訂等三個領域，以下分項討論。

（一）元代監察制度

此爲先生早期的學術重心，從碩、博士論文選定元代臺憲爲題，到二〇〇三年《元代臺憲文書匯編》出版。三十年間研究監察制度，此一選題並非偶然。中國史上各種形式的監察制度存在已久，連異民族建立的諸征服王朝也採納此制度。監察體系

^⑧ 洪金富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遼金石刻拓本目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頁x。洪金富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元代石刻拓本目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頁ii。

^⑨ 此外還有未刊稿多種。

主要有二，一是諫官，主言事，代表衆官僚節制君權。一爲察官，主糾彈，爲帝王之耳目，藉以控制所有臣下。元代諫官多遭廢除，僅存名目，而察官大興，不僅中央有御史臺（三臺：內臺、中臺、大都臺）主宰一切監察彈劾工作，地方上還設置了兩個行（御史）臺，下設按察司（廉訪司），嚴密監控全國二十二道。文獻記載忽必烈嘗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手的。」¹⁰即元代君主削弱言事臣諫諍、封駁等權，重新設計監視、鑒察百官的機構與制度，將一切官僚體系視爲「朕肢體」之明證。而有元之衰亡，與監察系統任用親舊，終至徇私枉法，削弱社稷亦有所關連。可以說是元史研究中關鍵分野之一。

先生回憶，當初發現元代監察諸制不見於前代，皆爲首創，亟欲瞭解。但遍尋國內外研究，發現學界既有成果相當不足，有不少著作甚至從宋代直接跳到明代，完全忽視中間的元代，令其大惑不解，發願釐清相關制度。一九七二年以《元代監察制度研究》撰寫碩士論文，一九七五年〈元代監察制度的特色〉一文，上承碩士論文的結論，進一步與其他朝代監察制度研究互相比較。嗣後赴美攻讀博士，柯立夫師原欲其將《南臺備要》全文英譯註釋，以爲博士論文基礎資料。《南臺備要》原書已佚，僅見於《永樂大典》中所引錄的83條遺文，每條文字即一則南臺原始公牘。細查後，知篇幅總和甚長，英譯談何容易。又現存文字恐未達原書全文之一成，未成體系。僅用此書撰寫博士論文，恐有偏廢，故轉以《元典章》卷5-6〈臺綱〉爲研究對象。

總體來看，《元典章》兩卷〈臺綱〉的44個條文固然簡明扼要，但《永樂大典》中的多種佚書遺文，以及元人文集中的相關奏疏亦需涉及。這些材料都需要處理，對文獻的掌握才能更爲全面。博士論文寫竟，暗立心願，日後必定要將相關史料，盡收眼底。

一九八二年以元代監察相關論文完成博士學業，開始研究工作。無法忘情於求學階段師長所展示的駕馭元代多語文史料的能力，入職史語所初期，較少從事與元代監察有關的課題，而是多角化經營元史研究，開展了各種考證。直到二〇〇二年〈元代監察官吏的出巡日期問題〉一文，才重新回返元代監察研究。翌年《元代臺憲文書匯編》出版（圖三），全面蒐羅已知的元代監察相關原始文獻。此書首次採用「縮行換格法」來處理公文之中多層次引用前文案情的複雜框架，開創斯界之先河，對於日後《元典章》等其他古代法令文獻的整理頗有助益。¹¹雖此書出版之後研究方向轉變，未再撰寫關於



圖三：《元代臺憲文書匯編》書影

¹⁰ 葉子奇，《草木子》（正德十一年葉溥刊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倉石文庫藏書，編號30267），葉76b。

¹¹ 此法之廣泛應用，應爲洪師在此書中首創。元代公牘若引用公文前情並無此形式，《元典章》中有部分文書曾經出現類似的行首階梯狀縮排形式，多係尊稱抬頭（如「聖旨」、「皇帝」、「奏」等）或標明行首所在。雖與公文引用格式無關，可能是啓發先生設計此呈現方式的來源。

元代監察方面的作品，但多年累積的研究成果終於編輯成書，一掃多年遺憾，夙願暫告圓滿。

前述一系列的研究，奠定了先生對元代史料的認識，開發了元代公文格式的處理方案，更啓迪了對文獻中所見到的胡語語詞，以及各種非漢制度之考證。

（二）胡漢語名義、曆日、制度之考證

先生治元代史，重視原始文獻的解讀。在元代史料中，經常發現不少名詞、制度方面的問題，殊異於前後朝代。只要一處難以解決，整段文本往往無法解讀。爲了解釋一個名詞，需理解歷代制度，不僅要遍覽所有可稽著作，還得請教其他善知識。縱然窮盡可爲之事，卻無法保證必能獲得良方。過程中常常爲了一棵樹，種出了一片森林，林中卻無一符合預設用途。有時打造砍樹所需的鋸子，反而做出了一系列可以採伐各種樹木的工具。

先生的考證文章，種類繁多，橫互其研究生涯首尾。一九八七年，〈數目字人名說〉，是第一篇刊行於《史語所集刊》的作品。用了百頁篇幅，舉出從唐代到清代，以數目字爲人名的例證，討論「清代以來學者，認爲元朝規定老百姓只能用行第或父母合計歲數爲名」一事，其實是種偏見。〈四十萬蒙古說論證稿〉、〈「欽此」再議〉、〈「受任使，服官政」——從《元史》的一個句讀談到忽必烈的掌印官董文忠〉等文，都是從單一名詞或斷句問題引發一連串的討論。〈髑髏飲器史料一則〉、〈元代馬球史料二則〉則是與前輩學者對話的過程。諸文中可見先生當時不僅關注元代歷史，更著眼於內亞史研究。

欲從事內亞史研究，胡語知識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除了漢文文獻之外，先生對蒙古語下了功夫。〈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問題〉、〈唐妃娘娘阿吉剌考〉、〈元代文獻攷釋與歷史研究——稱謂篇〉是其胡語考證中最精善，成績最爲可觀的「鼎之三足」。巧妙地將蒙古語、波斯史料與漢文文獻中出現的人名與稱號加以比對，得出異於成說的結論，是元史研究者必讀經典之作。此外〈元代蒙文漢譯「不怕那甚麼」的相關問題〉一文，結合蒙古語與元「硬譯」白話文獻雙語資料中的對應關係，全面探討特定語詞在蒙漢文碑銘中的語言形態，是以元白話對讀中世蒙古語文獻的示範研究。

先生考證史料，常爲史事繫日所苦。〈元代監察官吏的出巡日期問題〉爲與李治安教授商榷「廉訪司官」的分巡日期而作，文中引證多種元代公牘，考訂極見功力。過去利用公認的曆日工具書：陳垣《二十史朔閏表》與《中西回史日曆》，¹²發現推算特定日期十分麻煩，極易算錯，或須在多表之間反覆查對才能得出一個答案。爲解

¹² 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北平：勵耘書屋，1925）。陳垣，《中西回史日曆》（北平：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1926）。

決此難，先生一口氣將公元九〇〇至一四〇〇年長達五百年的中西合璧日曆，製成一大總表，命名為《遼宋夏金元五朝日曆》。從此干支、朔望、時日對應一目了然。據以檢查現存 97 條元朝怯薛輪值史料，寫成〈元朝怯薛輪值史料攷釋〉一文。提出史文之中存在錯誤，並進一步推測出造成文獻記載錯誤的原因。編寫此工具曆書，不僅自身受益，亦嘉惠廣大學林。

《遼宋夏金元五朝日曆》（圖四）涵蓋 6,195 個月，182,941 日。先生以此檢查陳垣《二十史朔閏表》以及張培瑜《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等權威著作，¹³ 在兩書中分別找出了 12 處與 9 處應該修正的錯誤，貢獻甚大。二〇〇四年出版至今，早已售罄，尋書之人不絕於途。十五年後的今天，如果此書有需要補充修正的地方，當屬不同曆法間的差異。「遼、宋、夏、金、元」使用的曆法各有不同，原書因襲陳垣先生舊例，以唐、五代、宋為主，附上部分遼金元朔閏相異處於頁首之末。近年出土文獻的刊布、史料數位化流通有爆炸性的增長，出現了大量可以增補、修訂的新材料。先生設計時雖涵蓋了西夏時期，但西夏本土在北宋滅亡後可能就不再使用北宋曆法。而黑水城所出土多種漢文、西夏文曆書，當中已有不少可以參校核對的線索。¹⁴ 近年發現的遼代漢文、契丹文墓誌中，也有可供採擷的資料。各民族政權的年號與帝號，也可依據胡語文書、碑銘考證增補。¹⁵ 出土與傳世文獻記載時有差距，值得研究者留意。



圖四：《遼宋夏金元五朝日曆》書影

在名義、曆法之外，先生還對元代制度研究投注心力。主要體現在〈從「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權的性質〉、〈元代漢人與非漢人通婚問題初探（一）（二）〉、〈元代的收繼婚〉三篇文章中。第一篇考慮的是「投下」分封制度，認為元代官僚制（州縣）與封建制（投下）的並存、並立，反映了元朝帝王不僅是元朝的皇帝，而且是大蒙古國的可汗。近年內亞史領域中引起討論的爭議之一，即「清代、元代是不是中國的一個朝代」。¹⁶ 早在四十年前，先生無意間在文中涉及了這個問題。呈現出整個元代是兩個制度相互拉扯的過程，並非「中原漢化了游牧民族」或是「蒙古可汗征服了漢地」

¹³ 張培瑜，《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第二版，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

¹⁴ 現存西夏曆書以俄藏最多，已可得見者有 12 種以上。其中份量最長的 ИHB.№.8085 保存了 1120-1207 共 88 年分的資料，參見彭向前，《俄藏西夏曆日文獻整理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此外 ИHB.№.5722 的星占文書也有關於曆法的資訊。

¹⁵ 例如遼代部分帝后有契丹小字哀冊、有契丹大字史書，西夏文獻也有大量佛經題記與世俗文書可供運用。

¹⁶ 元代部分，多為對杉山正明教授著作的評論。首先有姚大力，〈一段與「唐宋變革」相並行的故事〉，《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3.01.06。羅新，〈元朝不是中國的王朝嗎？〉《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3.08.11。刊出後羅新老師曾經公開聲明：「這是我給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戰》所寫的書評，發在新一期《上海書評》，因沒想好題目，就委託編輯給寫一個，沒想到是《元朝是中國的嗎》。本來也沒有什麼，但似乎容易陷入「什麼是中國」這樣的無解論辯。當然，我的重點也不是討論元朝的歷史歸屬。特此說明。」又參見杉山正明，〈杉山正明談蒙古帝國：「元並非中國王朝」一說對錯各半〉，《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4.07.27。杉山老師交稿前曾給筆者一份日文原稿，事實上此文刊行時標題也是編輯所擬，並非作者原題。三文內容均為立意良善的學術討論，藉此機會略加敘明。

如此單一答案。筆者以為，若將眼光放到中原以外的世界，觀察蒙古政權在佔領其他地區所推行的政策，例如波斯文《史集》中所呈現的樣貌，以及以波斯文轉述的蒙古語史料，對讀大元文臣轉譯國語後記錄下來的漢文文獻，更能理解蒙古人的統治技藝與習慣法。可從不同的角度貼近統治者的心靈世界，增進蒙元史東西史料間的對話。可以預見，波斯文史籍必定是將來處理這類問題的重要切入點之一。

而第二、三篇都是元代婚姻中的特殊現象，漢人與非漢人通婚牽涉到身份制度，收繼婚則與各地、各民族風俗習慣有關。¹⁷ 前一篇運用墓誌材料，後一篇則集中處理見於《元典章》等處，產生糾紛的案件。有趣的是，或因材料所限，已知的元代收繼案例通通都發生在漢人家庭中。其他族群狀況為何，尚未可知。而非漢人與非漢人之間的通婚問題，前文亦未涉及，先生認為均應在其基礎之上繼續討論。

本分類中著作，是典型「以小看大」之實踐，從微小的制度或歷史現象去討論影響廣泛的問題。師曾數度叩關已成學界共識，甚至是寫在教科書中的歷史敘述。做翻案文章，吃力且不討好，對研究者而言是種挑戰。先生下筆謹慎，著作至今大多禁得起時間與新出史料的考驗。

（三）元典章、遼金夏元金石文字之整理校訂

先生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就注意到《元典章》中豐富的記載，留學時還將一九七二年故宮影印本《元典章》（線裝四函 16 大冊）隨身攜帶，渡海赴美。博士論文也以《元典章》與監察有關的條文作為基本材料。與《元典章》結緣，既早且深。

各種存世《元典章》版本，祖本均為現藏於臺北故宮的元代坊刻本《大元聖政國朝典章》。這部元代法令文書彙編，條文本身已有許多模糊難解之處。元刻長期深藏大內無人知曉，明清民間傳承抄本，和一九〇八年據傳抄本再行刻印的「沈刻本」是學者唯一能運用的本子。唯諸抄本及沈刻本謬誤脫訛甚多，無法卒讀。一九二五年元刻本重新在宮中發現之後，陳垣利用元刻底本，沈刻本以及幾種抄本，找出 12000 多條問題，著成《沈刻元典章校補》一書，¹⁸ 討論古書底本和其傳承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各種錯誤情形。此書系統性整理古書的校勘方法論，並以《元典章》為素材提供了大量實例，是校勘學必備的要籍。後來改題，遂名為《校勘學釋例》。¹⁹

元代各種公文史料多已有點校本，唯《元典章》篇幅大，難度高，前人僅完成部分篇章的校訂工作，始終沒有完本。二〇〇〇年五至六月，先生立志開始《元典章》

¹⁷ 同輩收繼諸如「夫兄弟婚／叔接嫂／levirate」；異輩收繼即所謂「烝報婚」（「烝報」亦有作擴充解釋為同輩收繼婚者）。新舊約《聖經》中可見到一些為已故兄弟留後，接收亡兄寡嫂、亡弟寡婦為妻的記載，為一古老的習俗。參見《申命記》25:5-10，《創世紀》38:1-10，又見《馬太福音》22:23-28。此外還見於許多文獻記載，是古代社會常見的人類行為。

¹⁸ 陳垣，《沈刻元典章校補 十卷》（北平：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1931）。

¹⁹ 陳垣，《校勘學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59）。

的整理計畫。首先將白文進行標點，從頭到尾反覆讀了兩次，已耗費六年時間。期間還同步進行《元代臺憲文書匯編》、《遼宋夏金元五朝日曆》兩鉅冊，以及史語所藏遼金元拓片目錄的初期工作。二〇〇六至二〇〇七年開始點校工作，師工作前不參考前人成果，避免先入為主，影響判斷。而是將自己點校的成果，由助手協助比對與前人的差異，最後再由先生衡量是非，定奪去留。

二〇一一年，陳高華、張帆、劉曉、党寶海四教授合力點校的《元典章》出版，洪師再次比較陳、洪二本之差異。²⁰先後兩度比對前人著作，固然有接納先賢意見之處，但也有不少地方因言有所據，堅持自己解讀的正確性。洪本《元典章》（圖五）裝訂為四大冊，版型較前人著作為大。註釋豐富，資料詳贍。且繼續採用《元代臺憲文書匯編》以來研發的「換行縮格法」表示資料的不同引用層級，比諸前賢，更為清晰。書後附有多種附錄與索引，皆為先生親手製作。由於人物同名者多，逐一在每個人名之後加上了相關事跡。甚至有姓無名者亦一律收入索引。是敝人管窺僅見，資訊量最大的古籍索引體例。²¹



圖五：洪金富校定本《元典章》書影

此書的完成，端賴許多人的協助，已見諸前言、後記。先生對筆者強調，當中有兩位師友應該特別提出，表達感謝。其一，書中原本含有大量的箋證資料，詳述與其他文獻間的對應和差異。但因數量龐大，完成遙遙無期，先生騎虎難下，舉棋不定。蕭啓慶師認為曠日廢時，且難以周全，影響出版時程，建議將已完成的箋證部分先行刪去，日後再考。若非此一安排，洪本《元典章》恐怕依然在箋證中煎熬，解脫無期。²²

其二、本書之索引 C〈譯語索引附釋義〉，彙整全書特殊的非漢文譯語，諸如「只哈赤八剌哈孫」、「牙昔忽司」等，並加以解釋。二〇一五年索引初稿完成後，先生寄給澳洲羅依果（Igor de Rachewiltz, 1929-2016）教授審閱，²³羅教授在高齡八十六歲，且身邊藏書已經全部捐出無存等種種不利的情況下，仍然援筆成文，給予寶貴

²⁰ 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北京/天津：中華書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²¹ 洪本《元典章》索引中列舉的元代人物，數量龐大，有許多現有的元代人名索引或列表不收之人，可以增補甚至修正相關記載。可對照王德毅、李榮村、潘柏登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9-1982）。Igor de Rachewiltz, May Wang, *Repertory of Proper Names in Yuan Literary Sources*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1988-1996). 又參見余大鈞，《元代人名大辭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6）。

²² 先生曾呈上序言請蕭師過目，但在全書出版之前的二〇一二年十一月，蕭師辭世。先生哀慟，動筆撰寫追思文。想要寫得更完整卻不能滿意，遲遲無法完稿。

²³ 羅依果教授任教於澳洲國立大學，為著名蒙古史專家，對漢、蒙古、波斯語記載的蒙古史料研究甚深，經常幫助學界友人，提攜後輩不遺餘力。其《元朝秘史》詳註英譯本為傳世之作。Igor de Rachewiltz,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Leiden; Boston: Brill, 2004, 2006, 2013).

建議。在一個多月內，分七次寄來補充意見。先生照錄大部分意見於已說之後，並一一標明貢獻。²⁴

《元典章》校定以外的另一項重要成就，是對於中研院史語所藏遼金元（包含西夏）拓片的整理。如前已述，先生以十六年時間編纂《遼金石刻拓本目錄》與《元代石刻拓本目錄》，收錄共 1163 種拓片。在此計畫的前置作業中，集成了幾種副產品。包括現在對外公開的「遼金元拓片數位典藏資料庫」，以及《遼金元金石文字條目》與《遼金元金石史料集錄》等未刊稿多種。此外，〈和林元碑與嶺北官員管窺〉一文也建立在對金石文字的理解之上，重新解讀一批蒙古草原上半毀元碑上的殘破人名、官職名，藉以勾勒、重建吾人前所未知的歷史碎片。²⁵（圖六）



圖六：遼金元拓片數位典藏資料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遼金石刻拓本目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元代石刻拓本目錄》書影

師嘗言，因為不必擔心升等，才有可能著手整理這些數量龐大的史料與金石拓本。每一部著作都歷時十年以上時間，在每天都看不到盡頭的日子裡，十分艱苦，想快也快不得。《元典章》全書尚未完稿之時，先將序言發表，藉以激勵自己。箇中辛酸，筆墨難盡。先生在《元典章》首末，兩度提起下面這段話：「學海無涯，生命有

²⁴ 羅依果教授與先生只在三十年前，於臺北一場學術會議上見過一面，相處不過幾個小時，卻奠定日後數十年魚雁往返，以郵件討論學術問題的深厚友誼。羅教授與芮跋辭（Volker Rybatzki）教授合寫《阿爾泰歷史語言文獻學》（Introduction to Altaic philology）一書時，曾就書中內容尋求先生協助，並將其列名於合編作者之列。二〇一六年洪本《元典章》出版之後，先生郵寄一份到澳洲給羅教授，未料在包裹抵達之前幾天，高齡八十七歲的羅依果教授突然駕返天家，終未看到成書。先生得知噩耗，遺憾之至，不勝唏噓。

²⁵ 以大阪國際大學松田孝一先生為首的蒙元史、中亞古語文學者，曾經組織探勘隊多次前往和林，實際考察原碑。重要成果如下，可與先生著作同時參看：松川節，〈カラコルム出土 1348 年漢蒙碑文—嶺北省右丞郎中總管收糧記—〉，《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12（1997）：83-98。宇野伸浩、村岡倫、松田孝一，〈元朝後期カラコルム城市ハーンカー建設記念ペルシア語碑文の研究〉，《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14（1999）：1-64。磯貝健一、矢島洋一，〈ヒジュラ曆 742 年カラコルムのペルシア語碑文〉，《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2（2007）：119-156。磯貝健一、矢島洋一，〈ヒジュラ曆 732 年カラコルムのペルシア語碑文（史資料紹介）〉，《內陸アジア史研究》25（2010）：167-177。筆者參與松田先生、森田憲司先生等人在龍谷大學長期舉辦的元史與石刻讀書會，對師長在蒙古、印度的文獻、史蹟探勘研究成果深感嘆服。松田先生曾寄贈研究著作，先師非常感謝。

限，《元典章》整理工作歷經十數寒暑終於完成，我沒有苦盡甘來的喜悅；書中未解的難題仍然盤繞腦際，心不能安；大量資料可以說明許多問題，時不我與。讀者覺得本書可用、好用，我願足矣。」²⁶

先生數十載苦行，胼手胝足，努力考證。製作工具，籌畫金針。若以一語總括畢生貢獻，愚生自忖，唯稱「大元史冊掃葉人」（蒙古語： $\text{ᠳᠠᠢ ᠣᠨ ᠲᠡᠭᠡ ᠰᠠᠰᠢᠷ ᠤᠨ ᠵᠠᠰᠠᠢᠴᠢ}$ /dai ön teüke šastir-un jasayci）。²⁷

三、追憶先師行誼

筆者在史語所擔任獎助生時，所內指導教授為卓鴻澤老師，研究胡語文獻，洪師經常垂詢勉勵。卓師離職後，導師改為先生，承師聲欸，機會益增。多年來蒙師照顧，銘感在心。老師齋號「百芬廬」，取其雅意。研究室門口貼了一張雲南華亭寺山門的彩色照片，上有一門額，大書四字「到此做甚」，與城隍廟龕上「你也來了」匾額，有異曲同工之妙。欲見聞者當頭棒喝，返樸歸真也。

先生退休後，仍每日到院辦公。師事親至孝，為探視尊長，經常南北奔波。家事倥傯，心神動盪，仍然積極參加學術活動。出國訪問、學術演講，均盡心準備。平時則繼續完成所內任務，承擔遼金元拓片整理出版之責，編寫目錄、圖錄等專書。

二〇一七年初，先生動念將畢生著作重新修訂，出版全集。開始彙整著書與抽印本中的簽條、附註，與來自學界友人的建議，展開重編計畫。筆者受託，與師合力整理著作目錄及出版相關前置作業。本序文後的〈著作目錄〉是此項工作的第一個成果，已經先生認可，打算擇期出版。

先生最後的幾部未刊著作中，過去曾多次對外宣告，初稿完竣者為《遼金元金石文字條目》47000 條與《遼金元金石史料集錄》22 冊。初稿裝訂成冊之後，仍持續增補，紙本有初稿、一稿、二稿之別，目前已經超越上述篇幅甚多。師始終有將其付梓印行的心願，唯因篇幅巨大，定價必十分高昂，出版甚為困難，迄無眉目。

²⁶ 洪本《元典章》，頁41, 2443。

²⁷ 本文蒙漢文標題為筆者所擬。私諡先師，先生應笑我。「掃葉」原為「掃除枝葉土沙」之意，後引伸為「校勘、訂正、校正書籍」之代稱，由來已久。如宋·鮑彪《戰國策校注·序》：「先哲言，校書如塵埃風葉，隨掃隨有。豈不信哉？」參見鮑彪，《戰國策校注》（四部叢刊本，涵芬樓影印江南圖書館至正十五年刊本），鮑序葉2a。與「掃葉人」相對應的蒙古語詞為「jasayci」（修定者、校訂者、糾正者、修理者），動詞詞根為「vjasā」（治、修理、修正，即回鶻語「yasa」）。「-yci」為表示動作者之後綴。「dai ön」（大元）二字出自元代碑銘「竹溫臺碑」正文第一行，為元代音譯。見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8 in Memory of Jigünteï."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4.1/2 (1951): 53. 清代則多寫為「ᠳᠠᠢ ᠣᠨ /yeke yowan」。蒙古語「ᠰᠠᠰᠢᠷ /šastir」為來自梵語「शास्त्र /śāstra」（典籍、經論、論書）之借詞，對應藏文的「བསྟན་པའོ་ /bstan bcos」（論著），滿文「ᠤᠯᠠᠪᠤᠨ /ulabun」（論、傳）。蒙古語「ᠲᠡᠭᠡ ᠰᠠᠰᠢᠷ /teüke šastir」則為「史冊、史籍」之意。

而進行中的《傅斯年圖書館藏遼金元石刻拓本選集》，乃研究過程中發現史語所藏品中有許多舉世皆無的孤本，又有一些拓本品質遠勝於他處所藏者，計畫輯出這類孤本、善本，編為《拓本選集》，目前已具雛形和部分完稿。人生最後數年，師日日在研究室中用兩臺電腦螢幕對照拓影以及文獻資料，逐字輸入，不假手他人。此書預計收錄傳圖藏重要遼金元西夏拓片多幅，提供高清晰度的彩色拓片。對紙面上的題記、印記全面進行解讀，並附有錄文、其他文獻著錄資料、收藏背景、前人研究等關鍵資訊，將成為斯學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書。

由於遼金元（包含西夏）金石拓片中，含有胡語文字或以漢字記音的胡語記錄，以及相關的非漢民族制度，欲深入碑文，常感困難重重。《拓本選集》中收錄的拓本，多有學者未曾涉足者。許多古代語言用法缺乏前例與既成研究可供依循，研究進度緩慢。先生常喟嘆《拓本選集》之難度，絕非先前編輯遼金元拓片目錄時可比，甚至較之費時多年、動用大量人力協助的《元典章》、《元代臺憲文書》更為複雜。猶如一個古老的迷宮，繞進去卻不知道該怎麼出來。筆者路經老師研究室門口，常被召入討論胡語、漢語拓片文字。事後查考與師討論的拓片，竟未收入已出版的史語所《遼金石刻拓本目錄》或《元代石刻拓本目錄》中，可見是先生在遼金元拓片目錄出版之後，於傳圖拓片中新得之物，該書稿價值可見一斑。

在編寫新書之餘，先生對先前出版的書籍也持續不斷修正。傳圖藏部分胡漢語金石拓片質量之精善，公認舉世無倫。但畢竟是近千年風霜摧殘之物，剝泐處仍需尋覓其他早期拓片設法補足。筆者承囑彙整兩部《拓本目錄》中已發現的問題，著手修訂。四處調閱拓片，與傳圖館藏互補。不僅如此，老師正在建立「遼金元石刻僅存錄」資料庫，收錄三類石刻：一是原石迄今仍存世者；二是原石不存，但存有拓本者；三是原石不存，但存有錄文者。並撰寫所有石刻的內容解題，對孤善本進行考釋，且對古今著錄該則石刻的研究文獻重新檢討，完成後計畫出版成書，或製作電子資料庫，公諸於世。

先師藏書甚夥，研究生涯累積的資料、文稿數量龐大。不僅研究室中雙層書櫃全滿，房間所有零碎空間幾乎全為書物佔領，有時僅容一人轉身。退休後得知許多基本要籍與傳圖館藏重複，捐贈無門。若託書賈處理，又復流散。其中尚有不少好書，後生不易取得。動念將己身藏書連同家人舊藏，成立一「遼金夏元圖書館」，免費對外開放。一則可提供學界同好讀書、討論的空間，對臺灣遼金西夏元研究略盡心力；又能使私藏變為公有，為更多人運用。先生已覓得處所，時常利用假日前往整理。

尊堂棄世之際，先生五內崩殂，心力交瘁。思及身後事，謂吾：「畢生著作在茲，一任後人品評。唯進行中的幾部書，牽涉廣泛。時間精力有限，不知何時告藏。吾老矣，若未及完成，亦是命數所定，無能為力。」時吾唯唯，不知所措。又囑我，

若異日爲其撰寫追思文，「請秉筆直書，忠實評價，不要客氣」，切勿蹈其未能爲多位尊敬師友撰寫之憾。如此重託，愚生固辭不受。師笑曰：「明天和無常不知道哪一個先來，學問之外要注意健康。青山常在，綠水常流。名山大業，不急一時」當時豪氣如在目前。

怎奈天不假年，己亥歲初，老師遽歸道山。衆人翹首期盼的著書完成無期，老師未完的心願也難以達成。讀書人爲書所累，莫此爲甚。生命的寶貴與脆弱，人生的選擇、價值與追求，老師無聲地講授了最後的一課。

作爲見證老師每日拼命工作，努力寫書身影的一介學徒，如今唯一能做的，是將師長的學術業績整理出來，作爲永恆的紀念。²⁸誠望作品中卓識得以彰顯，重要考證能讓更多人看見。期盼老師在天之靈，默祐著作目錄中的未刊稿，能有完成出版的一天。

²⁸ 本序言之說明文字依據老師生前口述歷史所言，加上筆者查證資訊與其他訪談所得。限於篇幅，此處僅就先師學術發展過程的歷程，略加說明，提供學界參考。期待先師親友舊識，在其他方面寫下更多回憶。敬祈知情者、親歷者惠賜資訊，惠予指正。

洪金富教授著作目錄（1972-2019）

洪金富、吳國聖合編（至 2019 年 1 月止）

說明：

1. 凡未注作者氏名者，均為洪金富單著。
2. 本目錄格式為洪師設定，現維持原樣，以為紀念。
3. 另有多種未刊存稿，暫缺不錄，俟後補上。

學位論文

碩士論文：

《元代監察制度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972。

博士論文：

The Censorial System of Yüa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1982.

專書

1. 《ᠠᠯᠲᠠᠨ ᠲᠤᠪᠴᠢ》（蒙文史書《黃金史綱》、*Altan Tobci*）漢譯稿，與札奇斯欽合譯。（未刊稿）
2. 《元代的蒙古字學》（油印稿）。
3. 《元代蒙古語文的教與學》（臺北：蒙藏委員會，1990）。
4. 《元代臺憲文書匯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
5. 《遼宋夏金元五朝日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
6. *Introduction to Altaic philology: Turkic, Mongolian, Manchu*, by Igor de Rachewiltz and Volker Rybatzki;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Hung Chin-fu (Leiden; Boston: Brill, 2010).
7. 洪金富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遼金石刻拓本目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
8. 洪金富校定，《洪金富校定本元典章》（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
9. 洪金富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元代石刻拓本目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

10. 洪金富主編，《遼金元金石文字條目》（未刊稿）。
11. 洪金富主編，《遼金元金石史料集錄》（22冊）（未刊稿）。
12. 洪金富主編，《傅斯年圖書館藏遼金元石刻拓本選集》（未刊稿）。
13. 洪金富主編，《遼金元石刻僅存錄》（未刊稿）。
14. 《洪金富元史研究論集》（未刊稿）。

期刊論文

1. 〈元代監察制度的特色〉，《成功大學歷史學報》2（1975）：219-276。
2. 〈元代漢人與非漢人通婚問題初探（一）〉，《食貨月刊》6.12（1977）：1-19。
3. 〈元代漢人與非漢人通婚問題初探（二）〉，《食貨月刊》7.1/2（1977）：11-61。
4. “China and the Nomads: Misconceptions 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on Inner Asi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1.2 (1981): 597-628.
5. 〈數目字人名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2（1987）：281-379。
6. 〈從「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權的性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4（1987）：843-907。
7. 〈髑髏飲器史料一則〉，《大陸雜誌》78.4（1989）：148, 163, 167。
8. 〈元代馬球史料二則〉，《大陸雜誌》80.1（1990）：25, 28。
9. 〈元代監察官吏的出巡日期問題〉，《新史學》13.2（2002）：157-176。
10. 〈元朝怯薛輪值史料攷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4.2（2003）：325-388。
11. 〈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問題〉，《漢學研究》23.1（2005）：461-494。
12. 〈《元典章》點校釋例〉，《中國史研究》2005.2：113-118。
13. 〈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2008）：1-40。
14. 〈唐妃娘娘阿吉剌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2008）：41-62。
15. 〈元代漢軍軍戶的正貼結構與正貼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0.2（2009）：265-289。

16. 〈元代文獻攷釋與歷史研究——稱謂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4（2010）：737-767。
17. 〈忽必烈乳母的不揭之謎〉，《古今論衡》21（2010）：31-62。
18. 〈《元典章》點校釋例續〉，《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24（2012）：46-54。
19. 〈元代蒙文漢譯「不怕那甚麼」的相關問題〉，《古今論衡》24（2013）：29-64。
20. 〈校定本《元典章》序〉，《古今論衡》26（2014）：75-114。

研討會論文

1. 〈元典章問題人名札記〉，「紀念楊志玖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暨隋唐宋元時期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2015.10.10，南開大學（未刊稿）。

專書（論文集）之一章

1. 〈從元史到新元史〉，收入程發軔主編，《六十年來之國學》第3冊《歷史學》（臺北：正中書局，1974），頁329-378。
2. 〈「欽此」再議〉，收入楊聯陞、全漢昇、劉廣京主編，《國史釋論：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下冊（臺北：食貨出版社，1988），頁635-656。
3. 〈元代的收繼婚〉，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頁279-314。
4. “The Tung Brothers: Tung Wen-ping (1217-1278), Tung Wen-yung (1224-1297), Tung Wen-chung (1230-1281),” in Igor de Rachewiltz, Hok-lam Chan, Hsiao Ch’i-ch’ing and Peter W. Geier, eds.,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3), pp. 621-645.
5. 〈四十萬蒙古說論證稿〉，收入蕭啟慶主編，《蒙元的歷史與文化：蒙元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頁245-305。
6. 〈「受任使，服官政」——從《元史》的一個句讀談到忽必烈的掌印官董文忠〉，收入邱樹森、李治安主編，《元史論叢》第8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頁142-150。
7. 〈和林元碑與嶺北官員管窺〉，《法國漢學》第12輯《邊臣與疆吏》（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324-351。